

杜恂诚 陈争平 朱荫贵 林刚 等著

汪敬虞教授 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

汪敬虞教授 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杜恂诚 陈争平 朱荫贵 林刚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杜恂诚 陈争平 朱荫贵 林刚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7-01-006374-4

I. 汪… II. ①杜… ②陈… ③朱… ④林… III. 汪敬虞-纪念文集;
经济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016 号

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WANGJINGYU JIAOSHOU JIUSHI HUADAN JINIAN WENJI

杜恂诚 陈争平 朱荫贵 林刚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513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6374-4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汪敬虞教授近照

它。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有最好的饮料——茶叶，以及最好的衣料——棉丝毛。有了这些粮食、茶叶和大量的棉花，他们就无需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货物。而他们的帝国~~那么~~那么广阔，他们的人口~~那么~~那么多，他们彼此之间的销售~~足以~~足以构成大量的充足的贸易，因而向国外出口~~并不必要~~。这一点说明，二十年来条约贸易何以没有达到第一个条约所签订时所设想的高度。

即使如此，贸易还是增长了。过去在增长，将来还要继续增长。生产大部分是剩余产品需要销售，——产品的交换，肯定会改变嗜好和促进需要——而各种交易的盈利又推动商人去进行新的尝试，扩大~~销售~~范围。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已经奠定了基础，并且得到~~成长~~成长。而去年(1899)一年的贸易额，在数量、价值和~~增长率~~增长率上，~~都超过了前年~~都超过了前年，~~表明~~表明这种趋势的增长，使得~~每个人~~每个人~~都感到~~都感到~~乐观~~乐观。去年(1900)第一季度又~~继续~~进一步的增长，税收比1899年同期增加了25%。~~在~~不幸得俄义和团运动一起来

汪敬虞教授手稿

(21 × 21 = 441)

第 页

题 目：

分类号：

P4

资料来源：

在哪里。尽管从情感上很难接受，为了民族的利益，茅以升别无选择。

时 间：

内 容：

1937年12月27日，钱塘江大桥公路桥首次开通的第二天，茅以升金渡坐船来到大桥的中间，亲手炸断了亲手建造的这座大桥。上个世纪的80年代，茅以升从儿往日本东京那里得知，大桥炸毁后，日军把日本全国的桥梁专家都找来，试图修复被炸毁的部分，结果均无功而返。抗战胜利后，茅以升于1946年再到大桥修复，实现了他“不修此桥不丈夫”的豪言，实现了他的终生愿望。

钱塘江大桥的故事，给后人一个苦涩的回忆。然而茅以升的崇高精神，却点燃了牛桥魂。

目 录

汪敬虞先生学术传略	杜恂诚(1)
庆贺与期盼	
——记敬虞兄的治学与待人	洪葭管(16)
良师益友 突出贡献	杨时旺(21)
散忆汪敬虞先生对我的教诲	马俊亚(25)
鞭辟入里 启迪心智	
——重温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问题的论断	徐鼎新(29)
1930年代上海和全国工业产值的估计	黄汉民(43)
永定烟业与土楼	江太新(54)
史学方法和历史实证主义	吴承明(66)
经济史学研究中区域划分的标准与模式	赵德馨(78)
认识兴趣与经济史研究	萧国亮(83)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汪 熙(91)
清政府时期汉冶萍公司日债述析	代 鲁(108)
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与“中国海军英国化”	
——兼论海关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陈诗启 佳宏伟(130)
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	方 行(153)
香港铸钱局(1866~1868)个案研究	林准祥(160)
试说明清皖南佃仆制度的历史地位	
——为祝贺汪敬虞先生九十寿辰而作	魏金玉(189)
古代商品经济中的需求及相关问题论略	
——以战国秦汉为中心的思考	李根蟠(201)

国民党国家资本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吴太昌(210)
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茶叶走私及主要防范措施述论	魏明孔(226)
清咸丰朝铸造大钱及发行官票、宝钞	史志宏(245)
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	朱荫贵(263)
民国时期的定货契约习惯及违约纠纷的裁处	刘兰兮(281)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虞和平(295)
对1927~1937年间中国机器面粉工业的若干考察	林刚(316)
近代中国工商社团的转型与发展	陈争平(333)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丝绸业的统制	王翔(357)
近代中国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探析	李一翔(379)
“官商资本”与民国经济政策诸问题初探	徐建生(397)
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邓先宏(409)
附录:汪敬虞先生主要成果目录	(443)

汪敬虞先生学术传略

一、走上学术研究之途

1943年，有一个青年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拒绝了中央银行俸禄优厚的聘约，怀着研究学问的坚定意愿，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一名研究生。那里的薪俸菲薄，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工作环境，但他却安于清贫。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村中，他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潜心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他，就是中国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

汪敬虞，又名汪馥荪，1917年7月20日出生于湖北省圻春县（现名蕲春县）。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1943年毕业。1943年至1945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生，1946年改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改任副研究员，1979年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汪先生系民盟成员，1988至1998年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两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以学者身份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1999年1月退休。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汪先生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气质和素养。从1942年开始，他在认真攻读大学课程的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国际金融问题，在重庆的《金融知识》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纽约金融市场之分析》、《联邦准备制度信用统制论》等文章，对美国的金融制度做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金融和经济学知识的文章。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期，汪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一书中，他担任其中工业部分的研究工作，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著作。当时，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著作是最为

完备和精细的。直到今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仍然不时地需要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

在中央研究院时期，汪先生还用英文发表了专著《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31—1946）和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与就业》（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Prewar China）以及在国内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

汪先生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49年初，他在报纸上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不能分开的”，有人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会“带来资本的浪费”，因此“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期，绝对不需要”；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的“周密与合理的安排”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个任务不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所能解决的；第三，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多数人只求温饱，消费需求种类简单，需求变化复杂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无需借助自由竞争的市场来体现消费需求的变化。^①这个意见，是从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当时，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汪先生在全国解放之前认定“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主要是他个人悉心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认识就更为深刻了。1953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他指出：“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②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当时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同志曾亲自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意见。发表以后，《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作了转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① 汪敬虞：《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16日和17日。

② 汪敬虞：《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工业化》，《人民日报》1953年5月21日。

二、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专题研究

解放后，汪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1957年，他汇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资料巨著是一部比较完备、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影响的书。出版以后，国内外都有对该书的评论和介绍。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汪先生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1953年到1965年，他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的主要有：《十九世纪外国银行在中国势力的扩张极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史料》、《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提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了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使人们耳目一新。

打倒“四人帮”以后，汪先生的研究工作进入旺盛的新时期。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中，他的专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相继出版。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等等。其中《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两书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的奖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汪先生的学术成果取得大丰收，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三册出版，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项大奖，他个人的著作《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相继出版。

汪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世谦让。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事，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助。

他抽不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一部书稿，却花了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十分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循循善诱，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自己的学生）修改稿子，发表时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

汪先生治学严谨，他宁肯在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上攀登，而不愿走平坦省事的所谓“捷径”。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资料工作，他乐意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整理出一些比较可用的资料。他是以协助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为了使自己所分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比较精确的数字，他不避繁难，从零碎的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统计，而不愿图省事，采用笼统估计的办法。例如，关于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生产的外厂部分，有人以外厂资本为华厂资本三倍为依据，估计外厂生产也相当于华厂生产的三倍左右。汪先生认为，这样估计虽然省事，但未必符合实际。因为，第一，当时对外厂资本和华厂资本的估计本身就不完整，而且在已有的估计中，两者的范围也不一致；第二，资本额的增加与生产额的增加并不能构成正比例的关系。^①他宁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收集资料，日积月累，不断补充和修正，而不愿做过于粗疏的估计。

当然他并不排斥合理的估计。鉴于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统计资料的贫乏，可靠性又极低，他认为大力收集整理统计之外，还应该容许用合理的估计数字对客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方面的经济进行估量。所谓合理，就是这种估计既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也是需要切实认真花点力气去做的工作。举例而言，近代中国广大的手工纺织业的纱、布产量，现有的材料使我们不可能一家一户进行统计。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估计应该是允许的。例如，从有统计可稽的全国棉花产量、棉花进出口量、纱厂用棉量以及有可能进行估计的棉花直接消费量等方面，估计手工纺纱所用的棉花数量和棉纱产量，再进而从厂纱和手工纺纱数量以及棉纱的进出口和直接消费等方面，估计手工棉织业的用纱量和棉布产量。估计的结果，往往同实际的情况大体上吻合。因此，他认为，如果两方面努力，齐头并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也许会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将得到顺利和正确的开展。

^① 汪敬虞：《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3期，1947年。

汪先生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像大多数有才能有学问的学者一样,在他对自己作估价时,看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和郭沫若、张仲实两位前辈在古史方面有过接触,一是他1951年曾为郭老查考希腊黑劳士(Helots)的身份地位^①,一是1952年曾为张仲实先生所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根据英译本进行校核。这两项工作都得到两位前辈的称许,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担任这两项工作并不相称,惟恐产生误差有负重托。1953年他又受严中平先生之命合作翻译马克思论中国的几篇评论。^②在翻译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要准确地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该译稿曾请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校阅,向达写了一篇译后记,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的论述^③,这使他亲身感觉到前辈学者的渊博恢弘,同时也感到自己的不足。他认为在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参加编辑的《中国近代统计资料选辑》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他多次计划作彻底的修改补充,却始终未能如愿,因而经常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其他一些著作也自我要求甚严,反复反省。实际上,他所反省的一些问题在整部著作中只是个别的小问题,无伤大雅,这样那样的局部小问题几乎是所有的高质量的好作品都会有的,但汪先生严于律己,甚至撰文作自我批评^④。

三、对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贡献(上)

汪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门学科的七个方面,他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现扼要介绍如下:

第一是资料建设。汪先生为收集和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勾勒出了1895至1914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使读者能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这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做了一件极有益的基础工作。

1959年和1962年,汪先生和其他一些同志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① 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1、112页。

② 见《新建设》1953年5~6期。

③ 见《光明日报》1953年11月28日“史学”栏目。

④ 如见汪敬虞:《回首杂忆》,《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840—1895)》，曾两次到上海收集资料，前后工作一年以上。上海是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也是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城市。在上海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他们在上海期间，先后共收集到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此，1962年上海《文汇报》专门作了报道^①。

汪先生对资料的收集从不满足，始终孜孜以求。他常常教导他的学生说，要做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先做资料工作，否则就没有发言权。当然，他并不主张单纯为资料而资料，而是坚持理论概括必须建立在大量资料的系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更加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第二是关于外资侵华的研究。汪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三部专著及一些论文。《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一部着重分析历史过程的专著，涉及外资侵华的每一个方面。这部大著由十七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组成，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研究十九世纪外资侵华过程的最为完整和详尽的著作。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甲午战争是一个分期点，因为马关条约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甲午战前，外资侵华是处于商品输出阶段，甲午战后则跨进了资本输出的阶段。但是历史过程是不能用简单的分期标志来取代的。他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第一是关于暴力掠夺。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条约口岸，获得了有利于推销外国工业制品的协定关税，还获得了保护外国在华商人财产的特权。若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逻辑的结论应是贸易的扩大和外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应是外国商人按条约的规定从事正常的贸易，因为条约已经提供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中国的市场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打开，外国商人的活动并没有受条约的限制。非法的、破坏中国主权和采用暴力的掠夺，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特点。它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国，却带有十六至十八世纪早期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的色彩，它同资本主义世界以所谓合法贸易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所谓正常贸易的补充。没有鸦片走私，正常的合法贸易在一个时期以内就无法开展。既是正常贸易，又不是正常贸易，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商品输出侵入中国的特点，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分析；就不可能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得出一个合乎

^① 《文汇报》1962年7月5日“学术之窗”栏目。

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结论。第二是关于资本输出。外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才大量出现的事实，但在此之前，外国在中国已有企业投资和借款活动。单是工厂一项，就有 191 个单位，资本累计合银圆将近两千万两。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财政和实业放款，初步统计，前后共有 43 笔，累计合库平银 4600 万两。这里出现了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香港黄浦船坞公司和中华火车糖局，出现了曾经垄断中国内河和沿海船运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出现了以海关洋税、地方藩库收入乃至各种产权作为抵押的借款。这就说明：在马关条约签订前，西方国家对华已有资本输出。但马关条约前的借款和企业活动，与条约签订后的资本输出有很大的不同。借款期限短，而且数额也有限，属于临时周转的性质。采矿是为了适应航运的需要，也就是贸易的需要。工厂企业，就几个重点部门而言，他们的主要目的，也都是为了扩大贸易的掠夺，而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这个时候，外国在华工业的两大部门——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一个是为了便利轮船的运输，一个是为了加速原料的掠夺。可见工业投资的步伐，也是紧紧跟着贸易的步伐的。所以，甲午前外国在华企业活动和借款，既是资本输出，又不是资本输出，这也是合乎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结论。^①

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从面上来把握当时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则是以一个典型人物为中心，作辐射状的研究，以此来深刻地展现外国侵华的历史过程。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 1863 年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 年离职以后，依然保留这个头衔，一直到他死去之日。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有所谓“赫德中心论”这样一种说法。他们美化赫德，歪曲历史。这是对中国人民历史的挑战。《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就是为了接受这个挑战而撰写的。全书以丰富的史实，揭示了赫德在中国海关的罪恶活动，揭示了他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掠夺，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掠夺，还参与了他们在中国的非法暴力掠夺的罪行。该书还揭示了赫德插手这一切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他参与了同样的活动，却往往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他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段，容易迷惑人们的视线。他把许多非法活动加以所谓合法化（如鸦片走私、苦力掠夺）。他把许多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打扮成维护中国主权的行径（如港口引水）。他把他的所有活动都说成是“为中国多办好事”。《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对赫德活动的特点进行透视，揭示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②可以说，《十九世纪西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序。

② 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引言。

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是姊妹篇，前者从各个侧面来研究，后者则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来研究，两者互为呼应，相得益彰。

第三部著作则是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正如作者在前言中告诉我们的，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末，距本书出版已有40年之久。在此期间，作者批阅了北京各图书中心所藏资料，还先后两次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馆藏19世纪中西文报刊和各种遗存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专著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专著既未能定稿付印，专题论文也有一部分未能及时发表。记得十多年前，笔者就曾数度对汪先生提及，希望老师关于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著作能够早日出版，这个领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之一。汪先生总说手头工作忙，等忙过一阵再说。后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第一卷是严中平先生主编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直到二卷脱稿后，老师才终于捡起自己开始于数十年前的稿子。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其历史资料异乎寻常的丰富。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之所以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首先就在于研究资料的不易获得。研究华资金融好歹还有档案可看，而外国在华金融业的档案资料很少，特别是1927年以前的外国银行档案，目前在国内几乎看不到。而当时几种主要的金融业刊物，如《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也主要是介绍华资金融业的情况，对外资金融的介绍比较简单。从该书的资料来源看，西文的报刊、海关报告、编年史以及西文书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时间越早，中文资料越少。而这类西文资料的特点是分散的、零星的，从个别资料来看往往是意义不甚明了的。作者收集这类西文资料所下的功夫之深，实在令人惊叹不已。零敲碎打是决不能建功的。作者是用“地毯式轰炸”的方法把这些分散而零星的资料收集、整理成系统而完整的资料，将若明若暗的历史过程重现在我们眼前。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的高效率。

对外国在华金融活动负面效应的强调，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能够高屋建瓴地把各个不同阶段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不同特点概括出来，然后提纲挈领地以史料和分析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虽面对纷杂的历史，却毫无纷杂的感觉。凸现各阶段主要特点的井然有序的夹叙夹议，使读者感受到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力量。

第三是关于买办的研究。汪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唐廷枢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买办问题。在《唐廷枢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

枢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关研究中的扬郑（观应）抑唐（廷枢）之论。有人认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集团中的人物”，“属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而郑则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作者认为，唐廷枢和郑观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企业。至于两人的不同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郑观应固然比唐廷枢看得深远，他的著作写了唐“看不到也说不出东西”，但在社会实践和实际效果方面，唐是高郑一筹的。^①

作者以唐廷枢的生平为中心线索，生发开去，精辟地阐述了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作者科学地论证了买办的双重身份。书中指出：“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也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买办不仅兼有商人身份，他还是一个特殊的商人。他和他的主子做同样的生意，但是这里却不存在真正的竞争。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却受到主子给予的保护和便利。他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却往往利用他主子的名义，打着他主子的招牌。他是洋行控制中国市场的忠实助手，同时又和通商口岸的钱庄银号、内地的行商坐贾结成巧妙的联盟。他做的是无本生意，但同时又有最充足的资金。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害怕封建王朝的勒索，却又从这种勒索中取得其他商人所不能获得的好处。总之，他是半殖民地特有的商人，他有着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和身份。^②这是作者在买办研究中的新建树。

从双重身份的研究，作者得出了买办财富主要来自其自营商业的重要论断。这同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作者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洋行与买办之间，佣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当时有许多洋行宁愿支付固定的工资，而不愿买办在生意中抽取佣金。60年代中期以后，佣金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到了60年代后期，有的仍能维持2%，有的则已下降到1%。从6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终了，1%的佣金率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到90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从1865年至1894年的30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海关两。30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的比例计算，则不过1200万多两。这个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数以千百计的买办的暴发财富的主要部分^③。作者认

① 详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结束语”。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五）。

③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16页。

为，买办以其特殊身份所从事的自营商业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径。

作者还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资本大量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史实。作者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接着，作者分析了为什么买办甚至比积累了更多财富的官僚、地主和旧式商人更愿意投资于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原因。作者指出：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的身上，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买办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①

对于买办投资或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评价，作者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书中指出：官督商办的企业，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这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在这个不断反复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也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②

四、对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贡献（下）

第四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生的研究。汪先生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经济史学界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由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性质

①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之（六）。

②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46页。